

张昌山 主编

滇云八年书系

旧刊文存

战国策派文存

张昌山 编

上

11

美國東坡

文庫

美國東坡文庫

11

张昌山 主编

滇云八年书系

旧刊文存

战国策派文存

上册

张昌山
编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数据

战国策派文存：全2册 / 张昌山主编. --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2.12
(滇云八年书系. 旧刊文存)
ISBN 978-7-222-10647-5

I. ①战… II. ①张… III. ①抗战文艺研究 IV.
①I209.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04277号

滇云八年书系

总策划：夏代忠 尹 杰
项目主持：刘大伟

责任编辑：刘大伟 尹 杰
责任校对：余 祁 博 林
装帧设计：王曦云
责任印制：陆卫华

书 名	战国策派文存（上下）
作 者	张昌山 编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www.ynpph.com.cn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850x1168 1/16
印 张	49.5
字 数	810千
版 次	2013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刷	昆明卓林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222-10647-5
定 价	96.00元（上下）

发行部电话：（0871）64191604 64107628（邮购）

目 录

前 言		1
发刊词		5
战国时代的重演	林同济	6
浮士德精神	陈铨	15
烛虚（一）	沈从文	22
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	岱西	30
蜚腾之死——希腊神话（一）	尹及	36
政治观：外向与内向	何永佶	40
两件法宝（仿希腊神话 1）	吉人	45
论大政治	何永佶	48
日本军部与元老重臣	王迅中	53
白话文问题——过去当前和未来检视	沈从文	57
偷天火者——希腊神话（二）	尹及	65
镜子——记一次被人遗忘了的空袭	曹卣	68
论均势	二水	74

“这个好！”（仿希腊神话2）		
——伊登乐园 与阿灵比亚	吉人	79
力！	林同济	82
叔本华的贡献	陈铨	88
反叛与反对——答联大某生	何永佶	95
挪威争夺战：地势与战略	洪思齐	100
五伦观念的新检讨	贺麟	103
续废邮存底	沈从文	113
留得青山在！——“工人无祖国”吗？	丁泽	118
论英雄崇拜	陈铨	121
地略与国策：意大利	洪思齐	129
隐逸风与山水画	岱西	132
富与贵	何永佶	138
寂寞的易卜生	唐密	142
学生运动的末路	林同济	150
如果希特勒战胜	洪思齐	154
从大政治看宪政	何永佶	160
读英雄崇拜	沈从文	167
中西人风格的比较——爸爸与情哥	林同济	175
敢问死？——希腊的答复	尹及	180

行行复行行	丁泽	182
鬼谷纵横谈（一）	星客	187
萨拉图斯达如此说！——寄给中国青年	林同济	190
欧战与中国	何永佶	192
花旗外交	林同济	197
张伯伦与楚怀王——东西一揆？	雷海宗	205
法兰西何以有今日？	洪绂	208
德国民族的性格和思想	陈铨	213
日本参战吗？	王迅中	219
苏联之谜	思齐	224
东击与西击	丁泽	228
流行文学三弊	朱光潜	233
尼采的思想	陈铨	238
苏联的巴尔干政策	洪思齐	248
敌人的新攻势	陈碧笙	251
死与爱——希腊对“死”的另一种答复	尹及	257
希特勒如何攻英？	何永佶	259
中国建筑的特点	童耄	267
烛虚（二）	上官碧	270
尼采心目中的女性	陈铨	274

中西人风格之又一比较——“活着”和“天召”	尹及	280
鬼谷纵横谈（二）	星客	284
新的文学运动与新的文学观	沈从文	287
消遣经济	费孝通	292
所谓中国“外交路线”	尹及	297
尼采的政治思想	陈铨	304
“小狄”的故事	永佶	313
“摆脱尔”（仿希腊神话3）		
——阿灵比士山的大政治	吉人	317
释大政治	洪思齐	321
龙虎斗	何永佶	325
小说作者和读者	沈从文	331
雨	疾风	341
鬼谷纵横谈（三）	星客	345
“非得已”——希腊对于“死”的又一答复	仃口	350
历史警觉性的时限	雷海宗	353
国防经济的新潮	沈来秋	357
君子外交——动口不动手	何永佶	361
希特勒与朱元璋	丁泽	370
谈妇女	尹及	376

阿灵比士山的革命	吉人	380
中饱与中国社会	林同济	382
现代战争的武器	曾昭抡	390
希特勒的外交	何永佶	396
娱乐？工作？	费孝通	403
尼采的道德观念	陈铨	408
鬼谷纵横谈（四）	星客	413

前 言

1940年4月1日，一份名为《战国策》的半月刊在昆明出版发行。自此，一个被称为“战国策派”（又称为“战国派”）的著名文化思潮应时而生。其核心人物是云南大学文法学院院长林同济教授，西南联大历史系雷海宗教授、外文系陈铨教授、哲学系贺麟教授，以及曾任教于云南大学的何永佶教授等。1941年7月，《战国策》在出版17期后，因空袭频仍，印刷迟缓，物价高涨而宣告停刊（《〈战国策〉停刊启事》）。期间曾出版过3期上海版《战国策》半月刊。之后，他们与重庆《大公报》社商定，自1941年12月3日起，每周三在该报开辟《战国》副刊，至1942年7月停刊，共出版31期。此外，雷海宗等主编的《今日评论》（昆明）、陈铨主编的《民族文学》（重庆）等也发表过战国策派学人的不少论著。

战国策派是一个涉及哲学、历史学、文学、政治学、文化学等多个学科的综合学术文化流派。撰稿人来自不同的领域，他们中除上述核心人物外，还有朱光潜、费孝通、沈从文、郭岱西、丁泽、陈碧生、沈来秋、王迅中、洪思齐、曾昭抡、陶云逵、梁宗岱等数十位，大都具有留学经历，属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当时主要在西南联大及云南大学任教。他们在改造国民劣根性、反对国民党政治腐败、坚持抗战等问题上观点一致，而在如何进行战时文化重建等方面，意见不尽相同。人们对其进行评论时，一般是围绕林同济、雷海宗、陈铨、贺麟、何永佶等核心人物进行阐述。

20世纪40年代，中国正处在血火交并、存亡继绝的时期，却又是一部分知识分子转向深刻的历史反思的年代。战国策派就产生于这样的背景条件

下，它的核心观念在其发刊词《本刊启事》中作了高度概括的表述：本社同人，鉴于国势危殆，非提倡及研讨战国时代之“大政治”（High Politics）无以自存自强。而“大政治”例循“唯实政治”（Realpolitik）及“尚力政治”（Power Politics）。“大政治”而发生作用，端赖实际政治之阐发，与乎“力”之组织，“力”之驯服，“力”之运用。本刊有如一“交响曲”（Symphony），以“大政治”为“力母题”（Leitmotif），抱定非红非白，非左非右，民族至上，国家至上之主旨，向吾国在世界大政治角逐中取得胜利之途迈进。此中一切政论及其他文艺哲学作品，要不离此旨。基于这样的理念，他们对数千年的中国历史、现实世界格局与中国处境及中国未来的文化重建等诸多重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看法。

《战国策》半月刊一出现，战国策派学人的主要观点一经提出，就受到关注，争论不休，并成为一个颇有影响的学术公案。1940年底，著名记者范长江到昆明特地访问战国策派学人，撰写通讯《昆明教授群中的一支“战国策派”之思想》，客观上使其观点在更大范围得到传播。20世纪40年代，对于战国策派思潮，响应者不少，批判者众多，由于与现实政治的种种联系，受到过不少评论家的强烈抨击，被定性为一个宣扬法西斯主义、为当局统治服务的反动思潮，成为现代思想史、文学史上的异端。这一倾向性观点一致沿袭下来。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些学者开始对战国策派思潮进行重新评价，对战国策派思潮学术史进行再反思，出现了一个新的学术高潮，推出了一批新成果。除原有的《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雷海宗著）、《时代之波——战国策论文集》（林同济编）、《文化形态史观》（林同济、雷海宗著）等著作外，温儒敏、丁晓萍新编了《时代之波——战国策派文化论著辑要》。有多篇博士论文都以战国策派为研究对象，如江沛的《战国策派思潮研究》（南开大学）、魏小奋的《战国策派：抗战语境里的文化反思》（北京大学）、宫富的《民族想家与国家叙事——“战国策派”的文化思想与文学形态研究》、路晓冰的《文化综合格局中的战国策派》（山东大学）、高阿蕊的《战国策派的美学思想初探——以陈铨和林同济为代表》（西南大学）等，还有多篇博士论文涉及战国策派思潮的内容。而写战国策派思潮的硕士论文及学术论文则更多。上述著述中，江沛的《战国策派思潮研究》，其深度和广度，都是新时期颇具代表性的著作。桑兵、关晓红主编的《先因后创与不破不立：近代中

国学术流派研究》则列专章用了上百页的篇幅阐述“战国策派与各方争论”，对战国策派作学术史的研究和探讨，给人以启迪。港台及国外学术界也不时推出研究战国策派思潮的论著。在近些年的研究成果中，台湾学者冯启宏的《战国策派之研究》，以及王尔敏在《20世纪非主流史学与史家》中对“战国策派”的论述值得关注。

战国策派文化思潮出现至今已有七十余年历史，虽历经坎坷，但作为具有鲜明学术个性和丰富思想内涵的学术文化流派，人们的关注与研究将会继续，争论不会停止。或许，这就是思想的价值与学术的生命所在。

张昌山

2012年12月于云南大学会泽院

发刊词

本刊自出版以来，蒙社会人士不吝指教，且拳拳以本刊主旨及发刊词垂询。本社同人，鉴于国势危殆，非提倡及研讨战国时代之“大政治”（high politics）无以自存自强。而“大政治”例循“唯实政治”（realpolitik）及“尚力政治”（power politics）。“大政治”而发生作用，端赖实际政治之阐发，与乎“力”之组织，“力”之驯服，“力”之运用。本刊有如一“交响曲”（symphony），以“大政治”为“力母题”（leitmotif），抱定非红非白，非左非右，民族至上，国家至上之主旨，向吾国在世界大政治角逐中取得胜利之途迈进。此中一切政论及其他文艺哲学作品，要不离此旨。知高明垂注，谨此布闻。海内同志，倘进而教之，则幸甚！

（《战国策》第2期/1940年4月15日）

战国时代的重演

林同济

一

我们必须了解时代的意义。

民族的命运，只有两条路可走：不是了解时代，猛力推进，做个时代的主人翁，便是茫无了解，即或了解而不彻底，结果乃徘徊、分歧、失机，而流为时代的牺牲品。

现时代的意义是什么呢？干脆又干脆，曰在“战”的一个字。如果我们运用比较历史家的眼光来占断这个赫赫当头的时代，我们不禁要拍案举手而呼道：这乃是又一度“战国时代”的来临！

说来虽奇怪，却不是无因无缘。历史自有历史的逻辑，快眼可以抉发。历史上自成体系的文化，只须有机会充分发展，不至中途被外力摧残而夭折者，都要经过一个“战国时期”。在我们中国，则上自吴越战争，下至秦始皇兼并六国，为期约二百五六十年。在古希腊罗马史，则上自腓尼基战争，下至凯撒时代，为期约二百年。埃及印度各体系的文化，也都各有各的战国一段落。

欧洲文化，崛起于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之后，虽处处显露着希腊罗马的影响，但在整个体质上乃是独立的体系。经过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地理发现，工业革命的各幕热剧，乃不可遏止地成为现代全世界文明的动力，并且还决定了现代世界史——人类第一次真正的“世界史”——的发展的模型与方式。我们细察二百年来的世界政治，尤其是过去半世纪的天下大势，不得不凛然承认你和我这些渺小体魄，你和我所兢兢集凑而成的中华民族，已经置身到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怒潮狂浪当中了！我们的时辰八字，不是平凡，乃恰恰当

着世界史上“大战国时期”露骨表演的日子。这段热剧，正在十六、十七、十八三世纪早已渐成雏形，就好像我们的“春秋时代”在许多方面也都是“战国七雄”的先驱一般。但真正开幕之期，似可以拿破仑战争为准，充量的揭发，大可能还要包括此后的三五百年。

二

战国时代的意义，是战的一个字，加紧地，无情地，发泄其权威，扩大其作用。

战本来是任何时代都有的现象，并不是战国时代的专有品。战国时代之战，所以大异于其他时代之战者，有三个大趋向在。这三个大趋向，因为各个文化体系的内外在环境之特殊，主观客观条件之差异，当然不免也有和缓与极端发展之不同，部分与充分表现之差别。却是演化的形势及发挥的作用，大体上都能够绰约相等。旷观中外古今，战国时代之所以为战国时代，战国的战之所以为战国的战者，理由都在这里。

（一）战为中心。每个时代有一个时代偏重的中心现象。这个中心现象一方面决定了那时代的“统相”（gestalt），一方面也就说明了那时代的意义。宗教时代，信仰中心。经济时代，企业中心。革命时代，社会改造中心。战国时代，战争中心。所谓战争中心者，战不但要成为那时代最显著最重要的事实，而且要积极地成为一切主要的社会行动的标准。在宗教、经济、革命各时代，战的主要动机，多出于信仰、企业、社会改造等事实；战的进行，也并不积极地干涉到信仰、企业、社会组织等等的主要内容。到了战国时代，战的威胁与需求迫切到一个程度而战乃竟成为一切行动的大前提。社会上的一切的一切都要逐步地向战的影子下取得存在的根据。一向所谓信仰、企业、社会改造等等大事情都要逐步地失去独立发展的自主权；战的威力反要加紧地，加速地，取得主动的地位，而积极地决定其他一切的内容与外表。

（二）战成全体。其他时代的战，性质不免“片面”。参战员的数目有限，作战物的品类不多。到了战国时代，战乃显著地向着“全体化”一条路展进。全体化的形势与程度，各体系的文化虽然各自不同，但尽其文化内在条件的可能范围，都一致力求“人人皆兵，物物成械”。这种气象，在中国的“战国阶段”就露出相当的规模。既不是以前的封建以至春秋时代所可比，更不

是以后的大一统局面下“雍穆熙和”“粉饰太平”的一套。在中国的战国七雄中，比较最能彻底推行全体战的，便是秦国。现代所谓全能国家如德、意、苏联等等，都可说是“秦之续”而变本加厉。正所恶作剧的时代，一方面是投机而生，一方面还要挟时而进的。浅见者流，到了今天还要死把整个全能的组织意义，当作一种专对民主潮流而生的反动而讨论，就好像宇宙间森罗万象，除了维克多利亞的民主政体，便没有更重大的事情，而一切历史上的事态变迁都必得拱绕着民主二字而或正或反！真迂泥极了。

这并不是看不起民主，乃是说事到今日，实在险恶到惊人的程度，就是轰动全球一百多年间的民主问题也竟然落到次等地位。把占着时代的核心，乃是“全体战”三字。有没有本领随时可作全体战，可作“战国之战”，乃是任何民族的至上需求，先决条件。

因此，民主政体应有不应有，再也不是你我哲理上较长比短所能决定；真正关键，全看民主与全体战的关系如何。而这个关系，也绝不是形式政论者所能先验预断；真正关键乃在乎一个民族对其所惯有的政体实际运用的活力，应变的机能之如何。民主与全体战本不必有先天注定的冲突；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正是全体战的一种好条件。这点将来再论，此刻所要指明的：时代意义的核心，必须先切实把握。目前的若干全能国家，尽管他们的发言代表人如何解释，在客观的历史作用看去，总是为了要民主而全能，毋宁说是要全体战而全能——就仿佛商鞅废井田、改税法、抑贵族、明赏罚，目的要把秦国彻底地变成个道地的战国时代的国家，哪里是要轻佻然拿着“反封建”来当他的大前提。

“一切为战，一切皆战”，这是全能国家的根本历史意义与作用。我们要知“时势”，用不着再捧出那班实验派的专家，请他们调查统计，来一五一十地在纸上苦作推敲。但看十数年来全能国家，一个跟着一个呱呱坠地，我们可以无疑地判断天下大势是不可遏止地走入“战国作风”了。

(三)战在歼灭。这恐怕是最重要的一点。战国的战，最惊人的色彩在这里；战国时代在人类历史上最无情的作用，也在这里。

战有两种：一曰取胜之战，一曰歼灭之战。前者结局，最多也不过赔款割城。后者的结局，则非到敌国活力全部消灭不止。在我们国史上，春秋时代七大战都是属于前者。吴越战争，开始露出歼灭的倾向。到了战国时代，便愈战而愈显出歼灭的本色。齐桓公“兴灭继绝”的半封建作风，晋文公“退避三舍”